



潛夫論

新譯

行印局書民三 / 書叢譯新注今籍古 / 譯注 成丙彭
類 學 哲 / 閱校 銘滿陳

彭丙成注譯
陳滿銘校閱

新 譯

潛

夫

論

三民書局印行

新譯潛夫論／彭丙成注譯．--初版．--

臺北市：三民，民87

面；公分．--（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ISBN 957-14-2777-2（精裝）

ISBN 957-14-2778-0（平裝）

1. 潛夫論-註釋

122.811

87000692

網際網路位址 <http://sanmin.com.tw>

© 新譯 潛夫論

注譯者 彭丙成

校閱者 陳滿銘

發行人 劉振強

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電話／二五〇〇六六〇〇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編號 S 03149

基本定價 伍元肆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ISBN 957-14-2778-0（平裝）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劉振強

人類歷史發展，每至偏執一端，往而不返的關頭，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溫故知新，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古典之所以重要，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並不是迷信傳統，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要擴大心量，冥契古今心靈，會通宇宙精神，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

基於這樣的想法，本局自草創以來，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幫助有心的讀者，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我們工作的原則是「兼取諸家，直注明解」。一方面熔鑄眾說，擇善而從；

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頗受各界的喜愛，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也有信心繼續推廣這項工作。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我們注譯的成員，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陣容的充實，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兼採經、史、子、集四部的要典，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

古籍的注譯，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注入一股源頭活水；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

導 讀

《潛夫論》的作者王符，是我國東漢後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論家。

王符，字節信，東漢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人，生卒年不詳。關於王符的生平，只在范曄《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九有簡略記載。他自小好學，有志氣節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交好。馬融生於西元七十九年，死於西元一六六年，張衡生於西元七十八年，死於西元一三九年，據此，則王符生活的時代，也是從東漢和帝、安帝到順帝、桓帝統治的期間。這是東漢王朝滅亡前的衰末之世。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王符既因為庶出，為重嫡賤庶的習俗所輕視，更因為性格耿介，不願意隨俗浮沉，所以始終不得仕進，終其生沒有任過官職，只是一介平民。《後漢書》本傳說他「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潛夫論》歷來受到人們的推崇，給以很高的評價，與王充的《論衡》、仲長統的《昌言》同被視為東漢最有影響的三部學術著作。《後漢書》本傳稱《潛夫論》「指訐時短，討論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並在王符傳末全文收錄了其中的《貴忠》、《浮侈》、《實貢》、《愛日》、《述赦》等五篇。唐代韓愈把王符與王充、仲長統並稱為後漢三賢，作了《後漢三賢贊》。《四庫全書總目》

認為《潛夫論》所說「多切漢末弊政」，更將三家之書比較而推許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本世紀的幾種重要叢書：《四部備要》、《四部叢刊》、《諸子集成》，都把《潛夫論》作為成一家之言的重要子書收入其中。當今，特別是在王符的家鄉甘肅，對《潛夫論》的研究已逐漸形成了熱潮，出現了不少研究王符和《潛夫論》的專著和論文。王符對漢末衰世的批判以及這種批判中所蘊藏的思想光輝，正在日益清晰地顯露出來。

東漢的和帝、安帝都是在小孩子時就當了皇帝，由太后臨朝，外戚輔政。這些外戚都是世家大族，他們控制朝廷大權，父子兄弟，盡封王侯，培植親信，安插爪牙，搜刮財富，搶掠婦女，生活淫靡，奢華無度。《潛夫論》中敘述：京城貴人作棺材，要遠到江南採辦名木，一套棺槨重達萬斤，砍伐累月，轉運數千里，工匠雕治，積累日月。小皇帝長大，就利用宦官殺逐外戚。宦官又乘機操縱朝政，其胡作非為，與外戚無異。這種外戚與宦官交替控制朝政的惡性循環，加劇了東漢的社會危機，造成政治黑暗、法禁廢弛、賄賂公行、賢才抑遏、吏治敗壞、民不聊生以及瀰漫於整個社會的種種本末倒置、是非顛倒、名實不副的衰世景象。

生活在這樣一個黑暗的時代，面對如此眾多的「衰世之務」，王符已無暇如王充那樣坐而論道，從容不迫地考訂虛實，只能尖銳地指陳時弊，評論政治得失，提出救困扶危的主張。今《潛夫論》三十六篇，除最後一篇為敘錄，〈五德志〉、〈志氏姓〉兩篇述帝王世次、姓氏源流，〈夢列〉、〈相列〉等篇雜論方術之外，其餘絕大多數篇章都是討論治國安民之術的政論文章。王符對當時社會政治的批判是廣泛而尖銳的，鋒芒所向，幾乎涉及當時經濟、政治、倫理道德、社會風

俗、邊防軍事等各方面。他把社會禍亂的根源歸咎於統治者的昏暗不明，嚮往著賢能治國，明君尊賢任能，信忠納諫的盛世。他結合自己的身世，針對「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阻其勢要」（《考績》）的現實，提出「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論榮》）的命題，要求統治者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建議採取考功、明選等措施來改革吏治；他反覆強調「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救邊》），即使談天命，也說「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過利》），強調統治者要重視民心的向背；他主張崇本抑末，重視發展農桑，愛惜民力民時；他十分關心邊遠地區的防禦和建設，反對放棄邊郡、內遷邊民的作法；他還廣泛地指斥了迷信卜筮、交際勢利、浮華巧偽等不良社會風氣。王符作為無職無官的在野人士，對民眾在弊政之下的遭遇感同身受，而且以冷眼旁觀的清醒總結了自三代以至東漢的歷史經驗教訓，他「未為醇儒」（汪繼培《潛夫論箋·自序》），其思想折衷孔子，而復吸取了申商刑名、韓子雜說等各家的精華。因此，他的這些批判，不僅作為衰敗時代的世相寫真，具有歷史的認識價值，而且其中包含的一些思想觀點，在當時有進步意義，就是到了今天，仍然能起到一定的借鑑作用。下面再對他的主要思想觀點分別作一些介紹。

一、選賢任能。這是王符治國的綱領。賢材主義的觀點和思想不僅構成《賢難》、《考績》、《思賢》、《潛歎》等眾多篇章的主旨，而且直接或間接地貫穿於《潛夫論》的全書。王符對賢材在治國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闢論述，《實貢》開宗明義就說：「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在《思賢》中，他還以治病為喻說明了重用賢材的意義：「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

待賢而治。」基於這種認識，王符尖銳地指出東漢政權已經到了官無直吏、位無良臣的地步，斷言它無法長久存在下去。

那麼是什麼使賢材不能發揮作用呢？王符認為賢材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王符在《潛夫論》中以大量篇幅反覆揭露和抨擊了各種堵塞、廢錮賢材的政策和觀念。

王符反對漢代逐漸形成的為世襲貴族壟斷政權服務的「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論榮》）的選人政策，針鋒相對地提出：「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同上）他認為以族系門第取人，或以此作為判斷一個人德能的依據，不僅荒唐，而且危險。他所說的論士必須定於志行，是指判斷一個人的根據，只能是這個人在實踐中所顯示出來的志向與行為，而不是他的命運遭際。在《論榮》中他還說：「寵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這等於說高官厚祿的人未必值得敬重，地位低賤的人就未必該受輕視，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這已是相當進步的觀點了。王符認為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世襲制度是非常落後和腐敗的。他稱那些自身無德無功於百姓，靠祖先的地位襲爵封侯，臥食重祿，欺壓百姓的貴族，是「素餐之甚者」，也就是典型的寄生蟲。王符的這些揭露是切中時弊的，以安帝時的輔政鄧陟為例，從其祖父開始，一家累世顯貴，據《後漢書》本傳記載，鄧家「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難道這一家子全是賢人？如此用人，政治能不黑暗嗎？

王符還認為皇帝的昏憤不明、偏私偏愛，權臣的樹黨營私、排擠陷害也是真賢不被重用的原因。他生動地描繪了他們對待賢材的心理。皇帝按理說總是喜歡太平，擔心動亂，希望長久，害怕滅亡的，但卻往往厭惡實現太平、導致長治久安的忠言正行，而對那些將要帶來動亂、滅亡的事物卻心領神會，一拍即合。他們標榜招賢，卻進賢無術；面對賢材，卻視而不見；他們信任的只是那些親戚和媚臣。權臣，即王符一再指斥的「當塗之人」、「貴寵之臣」，他們為了固寵保位，則有意要「播授私人」，引進奸黨。對於正直的賢士，當塗之人既害怕他們揭露自己的邪惡，又恥於身居上位而才智不及下屬，提不出好主張，又恥於好主張不由自己提出，於是千方百計壓制比自己賢能的人。所以王符深有感觸的說，賢材的難，並不難於成為賢材，而是難於免除災禍。「脩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無罪無辜，讒口敖敖」（《賢難》），這就使賢智之士只能鉗口結舌，無所作為。

王符認為要使賢材得到重用，必須實行考績。在《考績》說：「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這就是要按一定的標準對人材和官吏進行考核，通過考核激勵上進；通過考核辨別賢愚；通過考核進行清理。把那些「無功而祿者」、「懷奸藏惡者」、「臥食重祿者」統統撤換下來，從而為賢材任職開闢道路。王符的主張表達了受壓抑的賢能之士的呼聲，但在當時卻無法得以實現。

二、依法治國。按王符完整的思想體系來說，他所堅持的是德化與法治並重的主張。在《本訓》、《德化》諸篇中，他甚至認為法令刑賞只能「治民事而致整理」，「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

又說：「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把道德教化視為治國安邦最理想的境界。王符認為，要實現人們相親相愛、無互相傷害之意，人們的行為都合乎規範，不產生奸邪的念頭，這樣的理想的太平盛世，不是法律所能做到的，不是威刑所能強迫的，惟有道德教化才能完成。但是王符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他所處的時代只是一個「法亂君孤」的衰世，君主昏暗，輕慢法律，封贈賞賜，私愛重於公法；貴戚大臣操縱朝政，循私舞弊，「君令出而不從」，甚至「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衰制》）；官吏豪強，相互勾結，魚肉鄉民，製造冤案，普通百姓，投訴無門；社會上的歹徒，胡作非為，利用法禁鬆弛而逍遙自在，如此種種，王符在《述赦》、《愛日》、《三式》、《衰制》、《斷訟》等篇都有具體充分的揭露，並且反覆強調加強法治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鮮明的法治主張。

王符把法令賞罰看作治亂之樞機，也就是治國的關鍵，強調「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述赦》）。作為封建時代的學者，王符大膽地認為皇權不能完全不受法的約束，指出天子的使命在於奉天威命恭行賞罰，他總結漢高祖以來的歷史經驗，提出「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同上），他要求君主依法辦事，尖銳批評了君主私愛貴戚，不量材而授官，甚至給未脫桎梏的嬰兒以高官厚祿的作法，並警告說：「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思賢》）王符對於法治的另一個重要思想是執法要嚴，認為刑法的作用是威奸懲惡，為民除害，不可不予嚴行，只有顯行賞罰，民眾才能辨明善惡。他在《述赦》中以生動具體的事實駁斥主張法禁寬鬆、多行赦免的種種說法，指出赦免

頻繁，只能使惡人昌，善人傷，是以養奸活罪為仁，是殘害良民之甚者。王符主張對那些橫行無忌的貴族豪強、循私枉法的貪官污吏、謀財害命的歹徒，都要嚴加懲處。他說：「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三式》）「驚心破膽」之語，真是一針見血，令人拍案叫好，直到今日仍然有其借鑑的意義。

王符法治思想再一個獨特處，是把選材用人和法治聯繫起來考察。一方面法治要靠賢材才能推行，「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思賢》），法規制度會走樣；一方面構成賢材的一條重要標準就是不以私欲損害公法。因此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的對立，其實質就是公法與私術的對立，「公法行則軌亂絕，……私術用則公法奪」（《潛歎》）。以權謀私的人總是要利用法規的空隙或破壞法規制度來達到目的，王符主張考績，要求實貢，就是要求把法治的精神貫徹到選材命官的過程，循名責實，以杜絕那些虛造空美、名實不副的現象，希望借助法治促成賢材政治的實現。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潛夫論》中，德化只是作為一個理想的境界而存在。在王符看來，立足於當時的情況而修談德化，未免不切實際。他所關注的更多是現實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只有解決這些問題，使國家得到初步的治理，實現他心目中的「中興」的層次，才有可能為實施高一層次的道德教化奠定基礎。這是王符有別於一般儒家學者的地方，他的思想以儒為主而兼有法家成分。汪繼培在《潛夫論箋·自序》中稱王符「精習經術而達於當世之務，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皆按切時勢，今今可行，不為卓絕詭激之論」，準確概括了王符思想的這一特點。

三、崇本務實。東漢後期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敗，普遍導致農、工、商業以及教育文藝、

倫理道德、人際交往等方面的本末倒置、捨本逐末的現象和浮華巧偽的作風。王符對所有這些本末倒置的現象進行了廣泛的批評，認為「明君蒞國，必崇本抑末」（《務本》），把分清本末視為「為國之大體」，亦即治理國家的根本指導方針。《潛夫論》中貫徹著一種正本清源以變風易俗的意圖，不僅在《務本》、《本政》、《浮侈》等篇中說得很明白，在其他許多篇章裡也多所涉及。

王符崇本務本思想的一個可貴處是他不只是在某些具體的行業上分本末，而是在諸多根本中首先強調一個根本的根本，就是以民為本。在這一點上，王符比許多古代的思想家都更明確。「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愛日》）中他這樣說；「貞良善民，惟國之基」（《述赦》）中他這樣說；「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救邊》）中他這樣說。王符認識到如果人民處於危難，國家決不可能安定；人民饑寒交迫，國家決不可能富足。王符也談天命，但在天、君、民這三者的關係中，他實際上是把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民心即天意，天意即民心，人民安居樂業，天心就順暢，人民憂愁痛苦，天心就不順暢。王符認為天之所以要立君，並不是對作君主的人有偏愛，要他來奴役民眾，而是要他來誅暴除害，為民謀利。因此國君應該對人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王符對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在《述赦》中他充滿感情地控訴層層官府對人民的迫害，在《愛日》中他充滿感情地斥責官吏對人民的騷擾，在《救邊》中他情不自禁地急呼：「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閱讀《潛夫論》，我們不難體會到，這種對人民的態度，使人民平安富足的良好願望，是王符評論政治法律邊防軍事，也是王符討論經濟問題的最原始の出發點。

關於經濟問題，王符在《務本》中說：「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雖然富民、正學並提，但前者是更為基礎的事。而「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這一段話是王符經濟思想的一個綱領。從其中可以看出王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古代重農抑商的傾向，在這裡百工、商賈並非與農桑完全平等的，作為「末」的游業中就有商賈。王符批評當時舉世捨農桑趨商賈，以至於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偽巧，充盈都邑，造成治本者少、浮食者眾的狀況，他還以京城洛陽為例，認為從事末業的十倍於農夫，游手好閒、投機取巧為生的又十倍於從事末業的，因而是一個農夫耕種，百個人吃飯，一個婦女養蠶，百個人穿衣，必然供不應求，老百姓不可能不饑寒交迫，如此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在生產水準還不高的東漢時代，王符這種批評是完全中肯的。此外，還應該看到，王符並未完全否定工商的地位和作用，他反對的主要是工商中鬻奇、取巧的不實之風。他認為工商各有其本、末，如果都能「守本離末」，同樣可以利國富民。這是一個很高明的見解，說明王符對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又有所糾正，有所突破，對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王符在批評經濟生活中的捨本逐末、追求浮侈的同時，還批評了當時上層建築、思想領域的種種趨華背實的風氣。如教育不重德義，以巧辯為能；文章詩賦缺少真實的思想感情，以詭辭麗語相尚；讀書人不以孝悌為本，專務交遊，拉關係，偷世盜名，以求飛黃騰達；對父母長輩，生前不盡心供養，死後卻大事操辦博取孝名；居官的不以忠正事君，不以信法對下，一味阿諛討好，

屈法循情等等。王符標舉這些本和末，其中雜有一些封建道德的因素，但總括看來，他所指責的這些華而不實、棄本逐末的現象，這些腐敗現象，絕大部分是對正常的健康的社會會起腐蝕作用的。

四、勸學重教。王符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他繼承了孔子「富而後教」的思想，認為百姓只有在解決了衣食住行等基本條件免於饑寒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接受教育，把「富民」與「正學」作為互相銜接的兩項治理國家的基礎工程，「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務本》）他認為教育可以使人獲得智慧，變得聰明，懂得道理，人民蒙受了教育，就能正禮義，美風俗，對教化民成俗的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

王符對教育的重視同他的樸素認識論觀點是密不可分的。王符認為，人不是生而知之的，「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材，不生而能」（《讚學》）。在《讚學》他列舉了黃帝、堯、舜等十一個古人心目中的「至聖」，說他們都不是生下來就成為聖人的，都曾從師學習，向別人請教，只有通過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聖人如此，普通人更應該學習，應該接受教育。王符雖然像許多儒家學者一樣，認為後人知識的來源主要是先聖所制的經典，但又強調主觀是可以在積習中改造的，「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同上）。美玉包藏在石頭裡面，如果不經琢治，美質就不能顯露出來；山野的木材不經巧匠的加工，不能成為貴重的禮器；蠶繭之絲，不經過女工紡織而加以五色，也不能成為華美的服飾；賢人君子即使有美好的資質，如果放棄學問，「抱質而行」，也不可能呈現賢才和美德。只有從師就學，按經而行，才能養成聰達之明，掌握德義之理，成為

近於聖人的人。這些思想閃爍著樸素的辯證法的光彩。

王符在學習方法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見解。如主張多讀書，說「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讚學》），把典籍比作黑暗中的火光，主張「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同上）。王符發展了荀況「善假於物」的思想，認為除了自身的經驗外，要善於廣泛學習前人的經驗，借助他物以豐富自己。又如主張慎微，重視積累。王符認為任何事物都是不斷積累而成的。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止，必極黃泉之深。人也是這樣，不斷地積累美德，就能成為賢人；不斷地增添惡德，必致成為寇盜。王符因為重視積累，所以進而提出慎微，要人們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不去。王符又指出積累的過程是一個正與邪、善與惡誰戰勝誰的過程。「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慎微》）所以君子應該日慎一日，扶植自己身上的正性去戰勝自己身上的邪性，實現自己戰勝自己。王符的結論是：「知己曰明，自勝曰彊。」這格言式的警語，今天仍然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上述用賢、明法、崇本、重教四個方面，是王符在《潛夫論》中表現得比較系統的思想，但絕非《潛夫論》的全部內容。《潛夫論》的內容是豐富而深刻的。王符在邊防軍事、看相占夢等方面都作過比較多的論述，有不少值得總結的思想觀點，這裡不予贅述，下面再就王符在《潛夫論》中表現的哲學思想作一些補充介紹：

王符在社會的政治、法律、道德的批判方面比略早於他的王充前進了一步，在哲學上則不如

王充的《論衡》自成體系，但他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潛夫論》的〈本訓〉一篇，是以討論哲學問題為主的。他說：「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而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這是王符提出的萬物生成論。當萬物未形成前，存在著由精氣合成的、沒有形跡的「元氣」。後來，「元氣」自身發生了變化，分別出清氣和濁氣，清氣成為陽氣，濁氣成為陰氣，陰陽二氣組成了形體，產生了天地。天地的陰陽二氣又化生出萬物；中和之氣化生為人。這裡包含了一些唯氣論宇宙觀的命題：第一，宇宙萬物都是由一種叫做元氣的物質逐漸發展而來的；第二，這個發展過程沒有誰來控制、駕馭，元氣翻然自化，分別出陰陽，這個變化沒有神秘的外力參與；第三，陰陽二氣中和的「和氣」孕育產生人類，人與天地並立為三，都是宇宙自然之一體。王符的這些觀點，同東漢時期占統治地位的神學觀念是根本對立的。

王符在〈本訓〉中還認為，產生了天地人的自然是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的。他們各自都有規律、法則可循。在〈本訓〉中他又說：「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為。」「為」的含義就是有所作為。王符充分注意到了人的主動性，他是把人放在三才中的主要地位來考察天和人的統一的。他曾用人坐在車上駕車、坐在船裡划船來說明天人關係。一方面人在車船上，正如被天覆蓋著、被地裝載著；一方面人又不是完全被動無所作為的，可主動駕御車船到想要到的地方。人正是在這種制約、束縛、依存、聯繫的關係中體現著能動的創造性。這是人可貴的地方。《潛夫論》